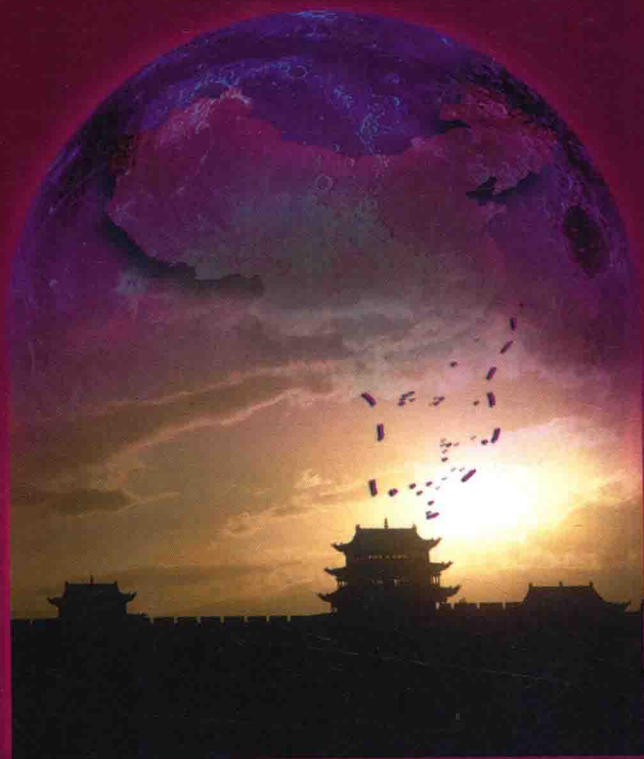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邹逸麟 主编



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主 编 邹逸麟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忠 吴松弟 唐晓峰 韩茂莉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全书共分10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概况。主要内容包括民族与疆域、行政区划及其变迁、政治中心的分布与变化、人口分布与变迁、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工矿业分布与发展、城市与交通、商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以及历史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等。

本书系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专著,是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将来的学术巨著。

本书可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交通、民族、商业和旅游等方面的科研、教育和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吴传钧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3-048209-9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人文地理学—中国 IV. ①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4604

---

责任编辑:吴三保等/责任校对:刘小梅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 敬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8 3/4

字数:648 000

定价:3680.00元(共12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胡焕庸 周立三 宋家泰 钱今昔

主 编 吴传钧

副主编 郭来喜(常务) 王恩涌 许学强 陈寅寅

沈道齐 李润田 吴三保 黄效文 陈宗兴

邬翊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希贤 王 铮 王兴中 王恩涌 刘 毅

刘君德 刘继胜 邬翊光 许学强 张文尝

张小林 张家楨 张绍飞 张耀光 陆大道

陆俊元 吴三保 吴传钧 吴楚材 吴建藩

李小建 李文彦 李润田 李振泉 陈 航

陈宗兴 沈伟烈 沈道齐 杨吾扬 邹逸麟

周一星 周尚意 周钜乾 金其铭 金学良

姚士谋 姚岁寒 郭来喜 郭焕成 黄效文

崔功豪 鲁 奇 谢香方 谢让志 彭 斌

蔡人群

学术秘书 陈 田 毕金初

#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认识到它的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整体,加以优化和调控的可能途径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在很多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人地关系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思想的渊源。比较系统的论述则见诸历代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各类地方志和游记中,涉及面广,但零星而分散,又和其他学科交错在一起,因而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个性是不明确的,只是知识和资料的积累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才随着其他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我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而陆续引进。此后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成立地理学会,并建立了专业的地理研究所,广泛开展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讲授和调查研究,但限于经费,工作规模小,出版成果少。

解放后,地理工作者得到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合各项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在初期的十多年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向原苏联学习,我国地理学基本上也按原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引进了不少原苏联地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加快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即三四十年代原苏联地理界在当时左的政治干预下,把人文地理学当作唯心主义“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引入了我国,致使我国人文地理学中一度出现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而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被视为禁区的极其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原苏联地理学强调发展二元论,把它肢解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属性不同、互不联系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人们敢于从教条的、空洞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重新评估和认识人文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性大,加以历史悠久而变化大,近年又处于改革阶段,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这就为人文地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发展人文地理具有天赋的优越条件。1980 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因势利导,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并相应地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推动、交流人文地理研究。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决定在各大学地理系中开设人文地理课程,个别大学还成立了专业的人文地理研究所,出版《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很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踊跃投入到人文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原先被冷落的一些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现在已成为热门;原先被视为禁区的一些分支,现在有人敢于钻研;至今尚无人问津的一些新学科,也有人开始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确实已走上复兴创新的道路。

今后的发展,总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这就要求联系我国的社

会、政治、经济实际,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问题,主题是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大量实践,逐步总结我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各项人文地理研究工作取得的有效经验,系统建立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生前曾主张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即: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科学家;二要有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三要应用具有本门科学特点的方法;四要在为国民经济服务中发挥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的作用;五要有大量本门学科的成果资料的积累。这五方面的尺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成果出版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是最具体的衡量。

为了系统展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成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组织人文地理学界合力编写一整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包括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争取于近几年内陆续出版。这在学术上无疑是对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阶段总结,还可和80年代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相匹配,完善对中国地理的研究。甚望通过《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出版,把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传刚

1998年中秋

##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新世纪迤降,纪元晋双千,地理学发展迈入多元多维结构的全息化时代。向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既表征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意义重大,又展示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生命力。

若把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5与16世纪之交航海引起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地理研究空间的大拓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激发了推动力,从而导致近代地理学的萌发,那么500年后的今天,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航天地理学应运而生,“人地关系”将进一步演变为“人字关系”,可以预见21世纪中期,将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人类的“天地生人巨系统”观会赋予地理科学研究全新的内涵,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将推动地理科学产生巨大的变革,不过人地关系仍将是研究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规律和地域分异系统为基本宗旨。作为世界上最高智能动物群体的人类,从其诞生之时,就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人类的繁衍与发展既受人类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支配,也受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有的学者把地理演化史分为天文时期、地文时期和人文时期,而人文地理学则是研究人文时期的人地系统,亦即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形成、演化、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人地关系论(man-nature relationship)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古典地理著作中便有所论述。《山海经》、《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我国古典地理学发轫期的杰出代表作。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对人地关系先后产生了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思想、天人相关论以及因地制宜等不同流派。尽管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乃至唐代刘禹锡主张人地相关论等,对人文地理学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从而阻碍了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近代科学。

近代人文地理学萌生源于西方国家。德国地理学大师李特尔(Karl Ritter)堪称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他最早阐述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统一性,主张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应从观察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和假设出发,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1822~1859)这一著作中,探讨了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嗣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同时,又主张由于有人类因素,地理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1882,1891)、《政治地理学》(1897)、《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1901)、《民族学》(1885,1886,1888)、《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1901,1902)等,对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所有对人文地理有贡献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19世纪后半期德、英、法、美、俄等国学者在阐述人地关系时,先后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以F.拉采尔、E.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

E. 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代表;“二元论”(dualism)——以 O. 佩舍尔(Oscar Peschel)、F.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和 A. 彭克(Albrecht Penck)为代表;“或然论”(possibilism)——以 P. 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Jean Brunhes)和 G. 弗勒(Herbert G. Fleur)为代表;“适应论”(adaptablism)——以 P. 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为代表;“文化景观论”(cultural landscape theory)——以 O. 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S. 帕萨尔格(Siegfried Passarge)和 C. 索尔(Carl Owtwin Sauer)为代表;“协调论”(adjustablism)又称“和谐论”(harmony)——以 B. A. 阿努钦(Всеволо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учин)、M. 怀斯(Michael John Wise)为代表。这些学术流派先后传播到中国,对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自 16 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殖民地不断扩大,伴随这种大扩展,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不少新的地理知识。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01)、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1649)、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 1559~1654),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法国人白晋(Joach Bouvet, 1656~1720)、杜德美(Petrus Jartoux, 1668~172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1774)等。19 世纪以来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考察,对中国地学(包括人文地理)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 1866~1952)、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n, 1870~1946)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2~1955)等。

20 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家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人文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自然会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既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先驱。他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22)、《天时与战争之影响》(1923)、《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是竺老早年对人地关系之论述。丁文江先生的《关于中国人文地理》(1923),张其昀先生的《中国人之传统》(1926)、《人地学论丛》(1932)、《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1935)、《论中国之人地关系》(1947),翁文灏先生的《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1929)和《中国人口之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胡焕庸先生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安徽之人口密度与农业的区域》(1934),黄国璋先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1941),李旭旦先生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王成组先生的《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1941),周立三先生的《农业地理》(1942),吴传钧先生的《中国粮食地理》(1942),陈尔寿先生的《重庆都市地理》(1943),任美镔先生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等等,对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建设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以刊物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季刊,1942~1949 年共出 6 卷,发表论文 136 篇,其中人文地理学论文即有 56 篇,若把地理学通论、地理学思想史、区域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育等论文计入,则人文地理学论文居于绝对优势,这种格局和国外地理学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30 年代初王海初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等所著《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30 年代中任美镔、李旭旦先生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eographie Humaine),陈健民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葛绥成先生翻译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环境与人类》(Environment and Race)(也译为《人种地理学》)等,在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起过不同的作用,特别是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所提出的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做的事业按三纲六目人地学基本事实来阐述,并指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也可影响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随科技发展水平而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作用是相互的,而人类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在中国影响十分深刻。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造就“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大气候,在地理学界,尽管对推动现代中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劫难。某些人把原苏联30~40年代非常时期的学派之争,生搬硬拉强加于中国地理学界,且无限上纲,恣意扩大,以致把人文地理学赶出学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记得1955年正当批判人文地理学高潮迭起之际,我在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称作“人文地理学批判”,它不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某种学术观点、思想和流派,而是批判这门学科,并给予全盘否定,满篇都是政治大帽子,诸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帝国主义服务”、“伪科学”等等,给当时青年学子们纯洁的心目中,造成了“人文地理学”与“恶魔化形象”等同的极坏影响。这样,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大地上便无立锥之地,被逐出地理学界。那时老师授课无讲义,更无教科书(也许奉命而教,违心讲授),我的笔录较详,还被一位报考留苏同窗借去参阅。嗣后我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并没有感受到像国内那样剑拔弩张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当时苏联地理界已在起变化,随即出版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导致苏联统一地理学的复兴,出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化,并以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名义在苏联恢复了人文地理学。

极左思潮在地理学界某些人群中泛滥,造就一些专门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学术新贵”,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若干年后还在肆虐,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和蹂躏。“文化大革命”中连经济地理学也不复存在,研究队伍被迫改行。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300多位地理学家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收到900多篇论文。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李旭旦先生的《人地关系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和吴传钧先生的《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又名《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揭开了我国复兴人文地理的序幕,迎来了人文地理学的春天!

李旭旦先生在报告中指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得到长足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应有所改变”。李先生进一步阐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近年西方国家还出现感应地理、行为地理学科,内容极为丰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因此,李先生疾呼:“应该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决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期西方各国的各种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今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

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物质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理论等”。

如果说在复兴人文地理学中,李旭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那么,吴传钧先生则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组织家和实践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工作(20世纪80年代扩展为经济地理研究部),则在经济地理的大旗下,掩护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领域,除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外,还有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等,一个研究室竟有近60名研究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传钧先生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在于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基础上,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主要内容包括:①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趋向的理论;②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与风险分析;③两大关系间相互作用和物质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整的途径与对策;④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⑤根据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结构潜力,预测特定的地域系统演变趋势;⑥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⑦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研究方法,使人文地理研究得以升华。

我清晰地记得,李旭旦先生做完学术报告后,1980年元旦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召开敬老座谈会,出席会议的12位70岁以上的老地理学家(如今大多作古)中,有不少多年没有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出席广州盛会激动不已,座谈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董绍良先生说:“我20年代就接触人地相关论,这次会上听大家谈人文地理学,我真像遇到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为了繁荣人文地理学而勇于创新”。

然而就在会后不久,有着失落感在“文革”中又自命为“红线代表”的某位以批判他人出名的人物,在座谈会上做了肤浅应景式检讨和言不由衷的道歉后,竟又炮制新的“批判”大作,罗织罪名,妄图把复兴人文地理之举,当作“回流”、“复辟”、“新动向”,再度置人于死地,李旭旦先生首当其冲。《西北师范学院院刊》把李先生的复兴人文地理学的论文和“批判”文章同时刊登,更增添了对他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委托李旭旦和吴传钧先生担任人文地理学分册主编,1981年冬在上海举行大百科条目研讨会,李先生忧心忡忡,此时,吴先生劝慰说:“难道您还怕戴第二次帽子?!时代不同了,不必理那一套!”

1982年2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做了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人文地理的重要讲话,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把人文地理学列为要加强的薄弱学科之一,从最高层次支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一度对人文地理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家”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为了适应人文地理学新发展,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杭州会议决定成立人文地理研究筹备组,推举8位学者为成员,李旭旦先生任组长;1983年5月在南宁举行首次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吴传钧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组,李旭旦先生为组长。198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4年7月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人文地理讲习班,加速培养高校人文地理师资。之后中国地理学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学院又举办了几期人文地理师资培训班,使人文地理师资培训和科学普及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李旭旦先生作为首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抱病参加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做了“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讲话。李先生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准则,走正路,技术手段必须创新,论题内容要创新,要采取实地考察与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向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进军……。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人文地理讲习班,但他仍以教育家的智慧和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这项活动。在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协助下,他主编了《人文地理论丛》、《人文地理概说》两本论文集。

李旭旦先生的仙逝,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在吴传钧先生直接领导下,由鲍觉民、张文奎先生主持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文地理学研究教育与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更上一层楼。鲍、张两先生的辞世,又一次使人文地理学界蒙受损失!

综观近14年来,我国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5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在西安举办的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在无锡召开的中英日城市地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人文地理学研讨会;1990年8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会议;1990年11月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3年5月与沿海开放研究分会在昆明共同举办的沿海沿边开放学术研讨会;1996年11月与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郑州联合举办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1997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8年4月在北京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从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分立出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还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育与研究会,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人文地理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列入全国高校的必修课,有的大学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了重点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设置了博士点、硕士点。

近10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中英文版,1988)、《人文地理研究》(1989)、《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等会议文集,吴传钧先生主编出版一套《人文地理学丛书》,创办了《人文地理》杂志(原名为《国外人文地理》)。一些学者还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专著,如《中国人文地理》、《现代人文地理》、《理论人文地理》、《人文地理概念》、《人文地理学》,以及多版本的《人文地理词典》等,还有更多的分支学科专著先后出版。一大批青年人文地理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中坚,使中国人文地理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特别是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心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和核心地位更凸现出来。

钱学森先生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史出发,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时,明确指出以研究地球表层为对象的地理科学的内容与方法。他高瞻远瞩地指明:“地理科学是一门学科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大部门之一,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地理系统是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研究。地理工作者要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从事“地理建设”,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来建设“地理科学”。黄秉维先生认为,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充分运用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成果,从区域解释性描述和地理数据图表简式表述,向全球与区域的监测、规划、设计、调控、优化方向过渡,实现不同尺度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逐步达到钱学森先生所期盼的“地理建设”和“地理科学”的前瞻性设想。

鉴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丛书),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自然地理学及各主要分支学科方面的成就,如今编辑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既是体现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全面评估中国地理建设成就的需要,也是为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实现中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自 1992 年酝酿、策划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以来,先后在北京、昆明做了多次协商,又于 1996,1997,1998 年分别在开封、西安和北京召开三次丛书编辑委员会,集中讨论了丛书编辑的宗旨、书目、纲要、体例、结构、分工和进度,确立了精而准、系列化、中国化的撰稿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位专家及其代表,一致表示争取在 1999 年完成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迎接 21 世纪来临的献礼。

借此良机,我谨代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丛书编辑委员会,向为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做出贡献,参加丛书编辑出版,以及支持和赞助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1998 年 4 月 22 日于北京中关村

# 前 言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精神和物质)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形成人文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人类活动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政治、军事、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商业、交通、文化、旅游、社会生活等等,这些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的空间分布、变迁及其规律,则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当代人文地理现象是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的延续和发展,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当代的人文地理。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当代人文地理学是两个密切相联的学科。

“人文”一词始见于《易·贲》,其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指人们的文采与礼义,也是指人类的行为规范,意思是说:观察大自然的行为规范,可知四季的变化规律;观察人们的行为规范,可以教化天下。这是将自然变化的规范和人类活动的规范等同起来看待。《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这里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管子·水地》则进一步认为“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接着就分析不同地理环境下人们不同的社会性格。总之,我国古代先贤认为人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行为规范是有地域差异的,这种差异则需要人们主动去适应。正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所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东汉王充《论衡·明雩》提出“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而行而应人”,主张人天各有所行,反对天人感应。但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无论古今,人地关系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

我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现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后序所引朱赣《风俗》和刘向《域分》里对战国至西汉以来各地的农工产业、商业贸易、城市交通、民俗风情等人文地理要素及其区域差异,都有极为生动的叙述,既写出了各区域的特点,又指出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同时还阐述了各区经济、文化差异的环境因素和历史渊源,是我国近二千年前的历史人文地理珍贵资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在我国,古代地理学一直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分支人文地理学包括历史人文地理学,不可能得到独立、系统的发展。汉代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大多没有人文地理的记载,只有《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里稍有类似的记载,南宋《舆地纪胜》和《方輿胜览》两部总志所搜集的诗文里,却保留着不少有关南宋各府州人文地理信息,涉及历史的较少,但对我们今天来说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人文地理资料。到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贸易的繁荣,地区经济、人文之间的差异日益凸现,学者们对人文地理的现象的注意已明显超过以往,丘浚《大学衍义补》、章璜《图书编》、谢肇淛《五杂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李培《灰画集》、王士性《广志绎》以及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等等,无论是资料辑录还是论述都保留了大量历史和当代的人文地理资料,可惜由于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的缓慢,因此人文地理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初开始,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1909年在北京成立“中国地学会”,并出版《地学杂志》,宣传了西方人文地理思想。当时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地理学者传播了西方地理学思想,开始重视人文地理。如我国现代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先生早年即发表了《地理与文化的关系》(1916)、《地理对人生之影响》(1922)、《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1932)、《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的关系》(1936)等论文,阐述人地之间的关系。以后胡焕庸、黄国璋、张其昀、刘恩兰、王成祖、李旭旦等先生都对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数追溯过历史的渊源或介绍过历史背景,但主要还是论述当代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还不成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历史人文地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实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

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主持成立的“禹贡学会”,开创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局面。一般印象以为当时的“禹贡学会”主要从事沿革地理的研究,其实不然。我们从学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自创办至停刊的7卷82期所发表的论文来看,除了一小部分是历史自然地理的论文外,其余大部分是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论文,沿革地理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大量的有关历史人口、城市、交通、物产、民族、文化以及边疆史地等等专题论文和考证。正如该刊7卷1,2,3合期后记讲到“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时说:“盖研究吾国地理之目的,端在明了古今疆域之演变,户口之增损,民族之融和,山川之险易,以及郡县建置,道路修筑,边城关堡之创设,运河沟洫之浚蓄,土地物产之利用,其所关民生经济及国家大计者为至重且巨也。”可见历史人文地理在“禹贡学会”同仁的头脑里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片面学习原苏联的结果,地理学界重自然轻人文的倾向也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界,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受到了冷落,主要表现为以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地理学代替了全部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的人文地理研究也不免受到影响。然而作为中国人文地理一个分支的沿革地理学,由于深厚的传统和客观形势的需要,不仅没有萧条,反而有了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由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该图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从1955年开编,到1988年出齐,前后竟经历了30余年。全图共8册,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晚清,共分20个图组,有图304幅。它不仅包括了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而且也包括各边区少数民族政权所管辖的地区,体现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伟大国家的历史事实。内容上以疆域政区为主,收录了全部可考的县级地名和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和界线,还收录了县级以下部分重要地名。此外,山岭、长城、边寨、关津等要素和重要交通道路,历代河流、湖泊和海岸的变迁,均以尽可能科学的方法予以表示。全部地名有7万多个。这部大型普通历史地图集不仅集中反映了我国沿革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而且也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是新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图集的框架是以历史人文地理分支政区地理为主的,因此可以说人文地理学中的政区地理学在几十年来发展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也推动了边疆史地的发展。但这毕竟只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就整个历史人文地理来说,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1979年末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上以李旭旦、吴传钧为代表的老一辈地理学家率先提出尽快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为复兴人文地理学揭开了序幕。1981年中国地理学会在杭州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人文

地理学讨论会,会上明确了人文地理学地位、方向和任务。1983年又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使人文地理的发展有了组织保证。此后现代人文地理学有了明显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历史人文地理学界。1982年谭其骧发表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一文,强调当前研究历史人文地理的重要性,他指出“要研究当代的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要认识当前中国的国情,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又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极为广泛。论人口则应推究各时代宽乡与狭乡的变化,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增殖与减耗,还要注意各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各民族的移动、扩散、分化与融合过程。论产业则要探索各地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品种及产量高低,手工业和矿业的特色与盛衰,作为商品的行销范围等,又要估算获利轻重对当地经济荣枯的影响。论交通则要研寻各水陆线路的开辟、移动、兴衰。论聚落城市的形成隆替,既要阐明各地区乃至全国的布局,又要指陈其工商业联系地区的范围。论疆域政区的沿革,既要考究建置分并、辖境治所的或沿或革,也要阐明其所以然和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论文化则要注意到各种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地理差异。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于此前此后的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恰当地指出各区的地域及其特色,是论述这一时期人文地理的重要内容。经济区域当然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形成的,而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全国和各大区域内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以及风物产地随着时代的推移往往也有所变动。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亟待开拓的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以上的论述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

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倡导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其成果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类是部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范围又分为断代和地区两类。断代是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和资料收集方便而形成的以一个历史时期为剖面,考察某一部门历史人文地理的现象分布、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如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人口、农业、城市、手工业、交通等人文地理要素作全面横向的考察。地区则以某一地区为范围,考察该地区某一部门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分布、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另一方面为区域历史人文地理的综合研究,也是近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一个可喜的方向。由于区域综合研究,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资料收集难度大,因此成果较少。但也只有区域综合性研究,才会对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最终影响有深刻的理解。

综观近十余年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状况,成绩是可喜的。但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这门学科的丰富内容以及对现代科学要求的标准而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成果的覆盖面上,都还有很大距离。例如研究的课题和方面基本上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模式,方法上没有更新的手段,思路还比较单一。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较新的突破,需要历史地理学界同仁共同努力。1982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谭其骧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目前正在进行之中。这部图集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属于人文地理方面的有疆域政区、军事战争、农牧业、手工业、矿业、交通、城市分布和规制、民族分布和迁移、人口分布、宗教、文化事业、人才分布等图组,反映了90年代中期的学术水平。这部图集的出版,必将对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谭其骧所说:“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领域中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先写一本综合性的历史人文地理著作作为基础以推动学科的发展。但目前要写出一本全面、深刻反映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专著,还存在不少困难。第一,历史人文地理内容十分丰富,各分支学科很多。全面开展历史人文地理不过是近十余年的时间,因此各方面研究得还不够全面,有的分支尚未涉及,已有研究的分支也不够深刻和透彻。即便是历史最悠久的政区地理而言,目前还只能说刚刚走出沿革地理的传统,要对历代政区的演变作出科学分析并探讨其内在的变化的规律,还有相当的距离。政区地理况且如此,遑论其他?第二,由于各分支学科研究不全面、不成熟,一套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目前还没有可以利用的一套完整的理论来统率各个分支,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编写这本著作呢?我们认为虽然目前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状况如此,但早日推出一本初步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专著,作为研究者的起点,对推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还是能起一定的作用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编辑了一套《中国自然地理》丛书,其中就有一本《历史自然地理》。当时历史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也很不全面、不深刻,更谈不上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本历史自然地理著作出版后,曾引起许多学者对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历史气候、历史河流地貌方面,不少学者就在该书的基础上作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国内外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该书对推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该书当然存在不少缺点,但其首发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决定来写这本书。

本书是集体之作。全书先由邹逸麟定出框架、体例,分头撰写。第一、二、三、四章由邹逸麟撰写;第五章由吴松弟撰写;第六章由韩茂莉撰写;第七章一、二、三、四节由邹逸麟撰写,第五节由华林甫撰写,第六节由戴鞍钢撰写;第八章由唐晓峰撰写;第九章由吴海涛、邹逸麟撰写;第十章由王振忠撰写。全书最后由邹逸麟统稿、定稿。书中插图除第六章三幅由韩茂莉绘制外,其他全由陈伟庆女士绘制。

本书作者都是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但个人研究领域毕竟有限。因此书中除了部分确为作者个人研究心得外,不少部分是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编写而成,书中基本上都一一注明出处,最后还附一参考文献目录,供读者参考。本书的缺点肯定不少,例如学科门类不够齐全,研究深度也不够,有的观点值得商榷。限于时间、篇幅和我们的水平,目前就只能以此奉献给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共同推进我国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本书撰写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49771026)的资助,特此致谢。

邹逸麟

2000年1月20日

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 目 录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 i )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 iii )
前 言	( ix )
第一章 绪 论	( 1 )
参考文献	( 8 )
第二章 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	( 9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华夏诸国疆域的形成和后代人文学区域的关系	( 9 )
第二节 秦汉统一王朝疆域的形成及其自然、人文地理背景	( 13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区民族的壮大与周边疆界的变迁	( 19 )
第四节 隋唐统一帝国疆域的形成——魏晋以来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 22 )
第五节 两宋时期各分裂政权的疆域——新兴边区民族势力的崛起	( 29 )
第六节 元统一帝国的出现——蒙古势力的扩张与各民族的融合	( 33 )
第七节 明时期中国的疆域形势——农耕、游牧、渔猎区的分裂	( 36 )
第八节 清帝国的形成——中华帝国最终疆域的形成,反映农耕、游牧、渔猎 三大区域的最后融合	( 42 )
第九节 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国土的沦丧	( 47 )
参考文献	( 53 )
第三章 历代行政区划的划分和结构、职能的变迁	( 54 )
第一节 秦统一前地方行政区划的出现	( 55 )
第二节 郡县制的确立与划分	( 56 )
第三节 州郡县三级制的确立与解体	( 61 )
第四节 道路制度的出现与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演变	( 67 )
第五节 行省时代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 80 )
第六节 地方行政区与自然区、经济区的关系	( 91 )
参考文献	( 97 )
第四章 历代政治中心都城的分布、转移和都城内部布局的变化	( 99 )
第一节 从七大古都的更迭看历史上定都的原则和实施	( 100 )
第二节 区域性都城和陪都选择的历史地理背景	( 107 )
第三节 古代都城内部建制和布局的变化	( 118 )
参考文献	( 131 )
第五章 人口的增长、分布和迁移	( 132 )
第一节 历史时期人口总数的变迁	( 132 )